第七章　結　論

先秦時期道家的派別最多，著作最豐富。《莊子・天下》將當時的學者概括爲八，除陰陽、儒、墨、名這四家外，其餘四家—宋鈃、尹文之學；彭蒙、慎到之學；關尹、老聃之學；莊周之學，皆屬道家。《荀子・解蔽》和《尸子・廣澤》各列六家，道家俱各占了一半。《呂氏春秋・不二》所列十家，道家也占了五家，可見在先秦諸子中，道家的興盛。而道家之中以學黃老道德之術的居多，黃老是先秦勢力最龐大的學術家派。黃老一進入漢朝，立時成爲一代的思想指導，實在事出有因，而非憑空飛來。

綜觀兩漢黃老學術思想的特點，在橫向面上，黃老思想的三個基本議題：形上論、政治論和養生論。三者之中，形上的道論是基礎。道是最高和最初的宇宙潛在性、秩序和能力的體現。這不但是執政者立足的基石，執政者要與道的原則協調一致，否則災難勢必降臨。而且執政者必須隨時長養自己，保持身心的健全，避免影響治國理民的判斷力。這些面相，已如前面各章小結所述，兩漢的黃老對於先秦黃老思想既有繼承，又有發展。

對於黃老思想縱向的發展線索，有學者指出，從哲學上說，漢武帝以後的道家，是沿者兩條相反的路線、三種不同的途徑分化和發展的。一條路線的途徑是保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的傳統，並向前推進它們的思想。《論衡》的部分內容和河上公《老子注》可以作爲代表。另一條相反的路線有二條途徑，第一種通過解說《老子》，把道家向唯心主義作引申發揮，並使它更抽象更玄虛。嚴遵的《老子指歸》，可以作爲代表。第二種途徑是把道家思想宗教化神學化，逐漸形成早期的道教理論，《太平經》和《老子想爾注》可以作爲代表。在這些演變中，道家思想的神學化是主要傾向，結果其產生了道教[1]。這裡所說從《淮南子》到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正是兩漢黃老思想發展的路線，它們各自在黃老思想的一些範疇作出探討；而道家思想的宗教化，則是黃老思想的另一變形。

再者，欲知一時代的社會文化狀況，必究其時的主要學術思想。因而如能把握一時代的學術思想，也就從主要方面把握了此時代的基本體貌精神。比較特別的是，黃老思想曾作爲一種社會思潮，一種意識形態。而一種學術思想一旦成爲風靡一時的意識主流時，它就必然介入社會、干預現實，既可產生振奮鼓舞的積極作用，亦可產生打擊摧毀的消極作用。

黃老在戰國末期就已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系統，又在漢初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，這些經驗已成爲可供取法的思想典型。這種思想典型是由黃老思想家群體所共同持有的信念、範疇、理論、方法等總和，它不僅對當時的思想文化起著奠基與指導的作用，對後來各朝亦有深遠的影響。尤其偏重於政治思想是黃老的主要傾向，這就可以破除人們常把道家思想說成是遠離現實政治的、

1 任繼愈主編《中國哲學發展史・秦漢卷》，頁638-639。

有濃厚消極因素的學說，這種評價對於老莊道家或許還有幾分正確，倘若把這種觀念套在漢代黃老道家身上，那就有誤了。漢代黃老道家並非老莊式的談虛弄玄，而是緊密聯繫當時的政治，這種具備政治特性的思想，對於後來中國歷朝雖然習慣採取儒家思想來治國，但當以儒家爲主的政治體制無法運作乃至於因戰爭、改朝換代而導致崩壞的時候，黃老道家因時變化，無所不宜的特點往往被用來作爲一種調整政策，達到救弊興利的目的，而與儒家思想形成一種互補的作用。

以上是黃老思想反映在兩漢的大致情形。另外尚有兩點，亦值得一說。

首先就黃老兼綜的思想特點所產生的影響而言。戰國時期，最早進行思想融合是從黃老這一系開始的，黃老思想繼承《老子》「容乃公」[2]的開放心態，發揮「有容乃大」的精神，由這種特點帶起了互相吸收，互相兼融之風，各家除了固守自家根本學說之外，還不斷的吸收它家思想以壯大充實自己，如儒家的荀子有許多道家思想，法家韓非其學歸本於黃老，到後來的《呂氏春秋》更是融匯百家之說爲一書。

兩漢時期是一個政治上統一，經濟繁榮，思想活躍的時代。這個新時期，剛經過諸子興起，百家爭鳴的思想開放時代，無論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組織都起了鉅大的變革。漢代思想家以其雄渾的氣魄和擴大的模式，結束了先秦百家爭鳴，諸子蜂起的局面。殊途同歸，百川歸海，以更高的形態，融合吸收先秦各派思想於自己的體系中，從而成爲中國思想以後的發展，奠定了基礎與方向，這時期的學術趨向與面貌以雜而多方爲主要特點，此印證於黃老學說的多樣面貌，正足以說明兩漢學術的特性也是由黃老思想精神得來。例如漢武帝之後獨尊的儒學，已不是先秦孔孟學說的原貌，而是經過董仲舒吸收了道、法、陰陽等各家的思想，成爲各種學說的綜合體；又西漢流傳之儒家經典如禮記、學庸、易傳，以及思想家如陸賈、賈誼、韓嬰、劉向、揚雄、王充等儒生無不源於繼承黃老傳統精神，容納百家，兼採眾家之長的基礎上，以鑄自我的面貌。由此包容性的思想品格，推而廣之，爾後中國對於外國文化並非一概的排斥，而是加以選擇、吸取和改造，使之與中國文化相融合，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，從而大大地促造了民族文化的發展。

另一個就是黃老與老莊的牽連。人們常說黃老是兩漢道家的代表，而魏晉則以莊老爲道家的代表[3]。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因爲老莊思想雖然源於先秦，老莊合稱也首見於漢初的《淮南子・要略》，但把老莊結合起來，成爲一種具普遍

---

2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十六章，頁124。

3 關於「老莊」或「莊老」之稱，王叔岷說老莊同舉，開始於《淮南子》，到了魏晉而著明，甚至有不稱「老莊」，而稱「莊老」。如《文選》干寶《晉紀總論》：「學者以莊老爲宗，而黜六經。」李善注引干寶《晉紀》：「劉弘教曰：太康以來，天下共尚無爲，貴談莊老。」《世說新語・文學》：「諸葛宏年少不肯學問，始與王夷甫談，便已超詣。……宏後看莊老，更與王夷甫語，便足相抗衡。」置《莊》於《老》之上，是晉人好《莊子》，尤勝於《老子》的原因。(〈黃老考〉，《東方文化》十三卷二期，1977年3月)

影響的哲學思想則是魏晉玄學。然而何以由黃老轉爲莊老，這需要說明。

就整個道家思想體系觀之，道家從《老子》開山之後，由此母體發展出許多家數，其中的黃老與《莊子》各自著重並發展了《老子》思想的一個側面。總體上，《老子》的思想傾向於消極面，《老子》嚮往和美安寧的社會，追求質樸純真的人生，認爲典章制度、道德規範是人類純樸喪失的表現，它們非但不能解救人性，反而造成僞善和禍亂，故有「大道廢有仁義，智慧出有大僞」[4]、「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」[5]的批判性言論。因此，《老子》認爲聖人要無知無欲，以天道自然無爲作爲理民的依據，而不以仁義禮教治國。另一方面，《老子》思想又具備了積極面。如《老子》有尊王的思想，稱王爲「域中四大」之一[6]；也有點法治的思想，如主張「恒有司者殺者殺」，反對「代司殺者殺」[7]；也重權謀，如說「將欲歙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」[8]因此，《老子》鼓勵人們要去「爲」、「長」、「養」、「利」萬物，只是當功成業就，則不應眷戀名位，必須功遂身退。《老子》一書可以說既是一部政治思想書，同時也是一部人生哲學的作品。

《老子》的思想由《莊子》繼承，也由黃老繼承，然二者繼承的重點不一。基本上，《莊子》發揮了《老子》的消極面，而且比《老子》更趨極端。《老子》講治道，《莊子》卻反對任何形式的統治，明顯者如《莊子》繼承《老子》非毀仁義，而且批判更爲沉痛，揭露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侯」和「爲之仁義以矯之，則並與仁義而竊之」的可怕現實，發出「聖人生而大盜起」，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[9]的偏激呼喊，要求廢除所有政治制度，禮儀規範，甚至連君王都應去除，人沒有了社會化的束縛，就能夠無拘無束，逍遙而遊。《莊子》注重個人的自由，講究個人的修養，心靈的超脫，忽視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心，表現了嚴重的偏向。《莊子》認爲「予無所用天下爲」[10]、「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」[11]，完全漠視個人對於天下國家應盡的義務。可以說老莊之學否定禮教，主張出世，而且對於儒、墨、名、法諸家學說，一概否定，它無益於經世治國。相反的，黃老承認禮教，主張用世，重現實，政治思想是其重心，它發揚了《老子》的積極面又能兼綜各家之長而適合統治者的要求，這也爲何《老子》可以與重事功的黃帝結合的如此貼切。

以此特性比較黃老與老莊，二者雖然同樣繼承《老子》道論而開展其學說，

---

4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十八章，134。

5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三十八章，212。

6 二十五章，參帛書本。

7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七十四章，頁337。

8 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，三十六章，頁205。

9 《莊子集釋・胠篋第十》，卷四中，頁346，350。

10 《莊子集釋・逍遙遊第一》，卷一上，頁24。

11 《莊子集釋・逍遙遊第一》，卷一上，頁30。

但是漢人不甚重視《莊子》的原因，無疑是黃老主張法自然，無爲而治，沒有離開政治而說道；《莊子》僅談道體，不談政治，離開人類社會的現實生活，而談虛無縹緲的的玄奧之理。一般說來，人們不能接受，自然也遭到冷落。《莊子》在漢人眼中，僅作爲養性之書，而非治國之書。如《淮南子》以「老莊」並舉，其思想以《老子》爲基礎，自不殆言，而對於吸收《莊子》思想亦不餘遺力。據王叔岷的研究，淮南王劉安曾作《莊子要略》與《莊子后解》二書，而《淮南子》全書，其明引《莊子》之文僅一見，即〈道應〉「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，小知不及大知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」四句，但暗用《莊子》的則觸篇皆是，曾舉二百餘條例子[12]。然而《淮南子》吸收《莊子》的思想部份，主要是在描述道體以及個人修養心態、方法與境界上，而對於《莊子》鄙薄事功，消極無爲則持批判態度。如對於《莊子》所謂「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棄知，同於大通」[13]的消極無爲，《淮南子・修務》則「以爲不然」，這就足以解釋漢人心目中的《莊子》。又根據本文第一章的說明，兩漢與黃老有關係者五十餘人，注《老子》者十餘家，非毀者只有二家[14]。而史書明言治《莊子》者僅兩人，一是嚴君平[15]，二是班嗣[16]，由此即可看到黃老與老莊的不同際遇。

儘管二者際遇殊異，然而黃老不能永遠保持顯學的地位，相同的，《莊子》也不會永遠被棄置。在漢武帝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之前，黃老思想作爲政治的指導，學術方面也居於主流地位，此時學術的發展以黃老爲中心；獨尊儒術之後，黃老退出歷史舞台，儒家思想居於主流，黃老道家部分的政治思想與儒家思想融合，成爲儒家思想的一份子。在此之後，黃老只剩下修身養性之論。而修身之說，大致上道家各派並未有太大的差異，黃老思想是一種以道爲基礎的君人南面之術，此與《莊子》不搭調，但黃老思想中的修養理論與《莊子》相合，這就爲專講人生處世哲學的《莊子》思想的興起創造了條件。尤其經過西漢末年與東漢末年兩次政治動盪的因素，人們面對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激烈鬥爭，許多人感到富

---

12 〈《淮南子》引《莊》舉隅〉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四輯。

13 《莊子集釋・大宗師第六》，卷三上，頁284。

14 楊樹達認爲非毀老子者凡二人，一是轅固生。《漢書・儒林傳》：「竇太后好老子書，召問固，固曰：此家人耳。」一是劉陶。《後漢書・劉陶傳》：「陶著書數十萬言，又作《七曜論》，匡老子，反韓非，復孟軻。」(見《老子古義》附錄〈漢代老學者考〉，收錄於嚴靈峰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第十三函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)

15 見《漢書・王貢兩鮑龔傳》：「蜀有嚴君平，……修身自保，非其服弗服，非其食弗食。卜筮於成都市，……得百錢足自養，則閉肆下廉而授《老子》。博覽亡不通，依老子、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。」

16 《漢書・敘傳第七十上》記載桓譚欲借觀《莊子》，班嗣報說：「若夫嚴(莊)子者，絕聖棄智，修生保真，清虛淡泊，歸之自然；獨師有造化，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。漁翁釣於一壑，則萬物不奸其志；栖遲於一丘，則天下不易其樂。不絓聖人之網，不嗅驕君之餌；蕩然肆志，談者不得而名焉，故可貴也。」(卷一百上，頁4205)

貴榮華如浮雲，保終性命才真實。而且王莽的篡漢，粉碎了士人對儒家君臣禮儀的信仰；黨錮禍亂之後，部分人或持和光同塵，不譴是非，以求在亂世保身安命；或以放浪形骸，毀棄禮教相尚，於是他們便紛紛遁入了道家老莊之學，亦促成老莊的思想受到重視。

可以說老與黃老、莊老三者有同有異，近年的研究已能明白。至於由黃老到莊老的變化所呈現的思想內容，或是漢代以後，尤其黃老與魏晉之道家玄學的交涉，目前學術界尚未能清楚論述，這是值得重視的課題，只是這已非本文所能處理，尚待來日詳發之。

二十世紀是一個特別的時代，大量的古籍文獻紛紛出土，其中以道家文獻爲大宗，又絕多數與黃老思想息息相關。在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今天，我們探求道家思想，比起前人有著更好的文獻基礎，眼界應該放的更遠更廣，心思也應該下的更深更密。道家思想並非完全是老莊之說，也非完全消極退縮之學，在以《老子》爲中心所發展出的兩大路線當中，莊老與黃老有著不同的走向，尤其黃老它是一種全面性的理論，進可外王，退可內聖。當我們重新發掘黃老思想，其目的也不再是只舉出黃老道家歸結出來的思想，而是由此通過深刻地認識歷史以資借鏡，並廣泛運用於現實人生，如此方能契合黃老重功用的特點。